

【名家阅读】

叔本华论读书

□周树山

德意志民族是一个热爱思考和理性的民族,为人类贡献了很多伟大的哲学头脑。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这些名字为世人所熟知。德意志民族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民族。去过德国的人写文章谈见闻,对德国人无论男女老幼、何种职业,在车船飞机上,在公园闹市里,在一切可利用的闲暇时间聚精会神捧读的情景都敬钦不已。

叔本华是“意志哲学”的创造者,他的哲学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很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先生早年受过尼采的影响,而尼采思想的源头来自叔本华,后人总是把叔本华和尼采并列,认为他们属于同一思想体系。尼采当年买回叔本华的《意志与观念世界》时,似乎是受到某种幽灵的召唤,用十四天时间一口气把这皇皇巨著读完,立刻“屈服于他那强大、崇高的天才魔力之下”。是的,一个非凡的天才的精神产品,如同播撒在春天沃土上的种子,会产生更多的优秀人物。在后人的精神血脉里,总流淌着前人的精神因子。

叔本华的祖先曾是显赫一时的欧洲望族,由于家境优越,叔本华一生不愁衣食。叔本华认为有钱又有闲的人应该读书,富而无知而又不求知的醉生梦死之徒与禽兽无异。少年时他就热爱读书,为此父亲很忧虑,担心无人继承家族的经商业,才有了以游历欧洲为条件迫使叔本华放弃学问做一个商人的举措。尽管叔本华遵从了父亲的意愿,可他的选择是痛苦的、被迫的。所以,他是

一个最差劲、最忧郁的商人。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二年,他就彻底脱离了商业,全身心地投入到读书和学习中去。此后六年间,直到他完成博士论文为止,他一直在狂热地求知。他不仅精通了英、法等语言,而且对希腊和拉丁文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推崇并研读古代作家的作品,从那里学习到了思辨和睿智的表述方式。他写得一手好文章,成为独具风格的作家。不仅如此,他还兼习医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法律学、数学、历史、音乐等。这固然因为他有极高的天分,但与他的刻苦自励是分不开的。这些渊博的学识,为他以后的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叔本华最反对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他认为读书必须思考,如果不思考,只一味地读,和经常骑马坐车而步行能力必定减弱的人一样,将会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他说:有许多学者就是这样,因读书太多而变得愚蠢。经常读书,有一点空闲就要看书,这种做法比常做手工更容易使精神麻痹,因为在做手工时还可以沉湎于自己的思想中。我们知道,一条弹簧如久受外物的压迫,会失去弹性,我们的精神也是一样,如常受别人的思想的压力,也会失去其弹性。又如,食物虽能滋养身体,但若吃得太多,反而伤胃乃至全身;我们的“精神食粮”如太多,也是无益而有害的。读书越多,留存在脑海中的东西越少,两者适成反比。读书多,脑海就像一块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涂抹再涂抹的黑板一样。读

书而不加思考,决不会有心得,即使稍有印象,也浅薄而不生根,大抵在不久后又会谈忘丧失。

况且被记录在纸上的思想,不过是像在沙上行走者的足迹而已,我们也许能看到他走过的路径,如果我们想要知道他在路上看见些什么,则必须用我们自己的眼睛。

叔本华并非反对多读书,而是反对读而无思的人。由于叔本华善于读书、善于思考,所以,这个忧郁的哲学天才在三十岁时就写出他一生最为重要的哲学著作《意志与观念世界》,后来的一些写作,不过是对这本书观点的解释和延伸。应该说,作为一个哲学家,三十岁时他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叔本华在法兰克福的一座公寓里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除了一个佣人外,陪伴他的只有一条狗。天才总是孤独的,他必得承受这精神的苦役。他用冷静的目光注视着忙碌的世人和这广漠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烦躁,越来越狂暴乖戾。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世人终于听到了这位天才的声音。科学对神学的否定,社会主义者对贫穷和战争的控诉,生物学对生存竞争的强调,这一切,打破了欧洲大陆盲目而乐观的理想主义,终于,叔本华出名了。晚年的盛誉使他一生的精神劳作有了回报,他的思想很快传遍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并影响了后世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在此,我们重温他对读书人的忠告,仍然会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本文作者为作家)

【精神之旅】

聚书的苦恼

□施京吾

读书,历来有“与伟人对话”之说。我辈若能以伟人为师,且做一个孜孜不倦的后学,已是幸事——就这样一点菲薄的理想,也从来没有实现过。

岁月流逝,我们已无法将沉睡于历史中的伟人们一一唤醒聆听他们的教诲,于是,读书便成了通向他们精神的桥梁。

读书当然是要买书的,久而久之,读书、聚书俱成嗜好,成为一道颠扑不破的风景。不过说到聚书,形而上的精神生活一下子又掺杂进了形而下的物质消费,这道风景立刻变得不太风雅和美妙了,幽灵般冒出来的不仅是乐趣,更多的是苦恼。

“求不得苦”乃佛门之说,通俗地讲就是想要又要不到,宛若翩翩少年,面对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孩,始终不能得到她的青睐,此种心情大约不太好受。聚书的心情也正如此。寻遍了书市的角角落落,唯独想要的那一部芳踪难觅,心下是怎样的焦虑与不安,但是能从此拒之门外吗?不能,只能以钢铁般的意志在渴望中等待。

且说我的一段购书经历。商务印书馆的一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使我魂牵梦萦,丛书自1980年代初开始出版,到如今已历经三十余载。该丛书分哲学、政治、历史地理、经济和语言五大类,到目前已出版十四辑,累计六百

种、约八百册,这套丛书的出版属于浩瀚工程,每一部著作都具有特定的价值,它的翻译队伍也基本能代表中国各个时期的最高翻译水平,不论哪位读者,能把其中一个系列通读,即便不成大家,也可以做一个优质学者。这套丛书在读书界地位甚高。

出版工程浩大,而购书也同样是一件长时期的系统工程。我自1986年开始购买,到目前也接近三十年时间。如此漫长的时间并不能一本不落地完全收齐,尽管已经确保自己没有错过每一次相聚的机缘,但作为读者,不可能掌握准确的出版信息、上架信息,不可能每次到书店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那一种。虽然差不多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我亦只买了四百种、五六百册的样子。求之若渴,求之不得,其甘苦自知。前两年商务一次性推出全套丛书,整套出售,售价已达数万。这显然不是我所能承受的。

每当获得一部盼望中的书籍,就感到一块石头落地踏实了许多,不过,不久又复归沉重,因为还有未曾得到的,而且更多。

有时,与书的缘分并不那么好,有钱的时日并不那么长久,羞涩于阮囊倒不十分鲜见,只好免去逛书店的辛劳。尤其是早些年出版业不那么发达之时,最恼火的是,看到

最后一套书刚要拿下,却被捷足先登者掠走,颇有被横刀夺爱的怨恨,真想干上一架。但恼火是没有用的,只会斯文扫地,唯寄希望于那套书从此寻了好人家。

如今,聚书越来越难。众多的商业化的作者们的衮衮大作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尺度去衡量作品的价值已不必多谈,要命的是,书价的增幅远远超过读者支付能力的增长,令人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护紧了口袋。面对那些率尔不堪的作品,固然可以假装大义凛然地说出“一个小钱也不给”的话来,但“和伟人对话”却是愈发地艰难了,因为所需的不仅是圆融的智慧,还得用一摞摞钞票将自己垫得更高一些。三十年的积累,对书的存放也带来新的、更严重的问题:纵然买得起书,可买得起房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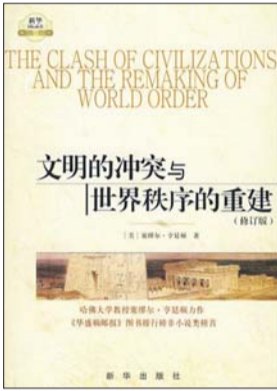
随着网络兴起,购书的战场也从实体店转向了显示器,网购对我主要起到配书的作用,大体上还保持着在书店购书的习惯,即便贵一点,毕竟有在网络上难以体会到的感受,而且容易控制消费,由于网络购书无须现付,等到去银行还款时,那心脏一阵阵的抽搐感,简直肉痛。

美国藏书家兼书话家爱德华·纽顿以《聚书的乐趣》成洋洋大作。乐趣当然是有的,于我而言却是苦恼更甚,遂将此文命名为《聚书的苦恼》。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王昱



《我的名字叫红》
奥尔罕·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讲述了被称为“西亚病夫”的奥斯曼文明,最初是怎样在欧洲文艺复兴的火光中,惊觉出自我的衰老的。书中弥漫的那份属于整个文明的彷徨与悲凉,作为“同病相怜”的东方人,我们最能感同身受。但作者暗藏其中的锐见与勇气,或许更值得我们掩卷深思。

《沉默》
[日]远藤周作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对于整个世界史来说,17世纪到19世纪江户幕府对基督教徒的迫害运动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细节。然而,本书的作者远藤周作却用它谈了一个大到不能再大的命题——《沉默》既是一个关于东西方文明思维方式碰撞的故事,也是一次关于信仰的追问。一个人,是怎样用背叛的方式为自己的信仰殉道的?在我们这个理想与随之而来的幻灭的时代,它的确是值得一看的书。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美]萨缪尔·亨廷顿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果说二战之前世界是各大帝国之间争衡,冷战时期的世界是两种制度之间的争论,那么冷战过后,当今世界竞争的主题又是什么呢?萨缪尔·亨廷顿说:是各文明间的冲突。有趣的是,上世纪90年代当这本书刚刚出版时,美国主流社会不承认亨廷顿道出了实情。直到“9·11”发生后,所有人都说这就是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的冲突”了,亨廷顿自己反而不承认了。

《有一类战犯叫参谋》
俞天任
语文出版社

日本也许不是中国人最常言及的国度,然而却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国度。同理,这个国家在近代史上与我们之间的那些恩怨,除去愤怒与热血,我们多数时候其实并不知之甚详。曾经嚣张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它的构成到底是怎样的?谁是真正的幕后元凶?日本人为什么会输掉上次战争?真的会有下一次吗?这本书将向你讲述那柄曾闪着冷色锋芒的武士刀是怎样被锻造又如何折断的。

(本文作者为本报国际新闻部编辑)

【古书今读】

传说和见证

□王佐良

《山海经》上说,禹导通了积石山,使漫天洪水得以顺畅宣泄。可是,积石山在哪儿?查《辞海》,积石山是今天青海境内的阿尼玛卿山!我深感惊愕。禹为了治水,竟然到过青藏高原!须知,那时候人们只能靠两条腿跋山涉水。禹果真到过那里吗?阿尼玛卿山真的就是禹当年疏导的积石山吗?还是积石山另有别处?

传说禹像一条虫,一拱一拱地疏通了九河。“拱”,意味着疏浚。沿着黄河,要找出禹当年疏通的河并不难,汾、洛、泾、渭,都赫赫有名。九,是形容多。禹始治水,人们还不懂得沿河筑堤(想一想鲧居然用“息壤”阻挡洪水!)。黄河无堤,河出津门(河南孟津)后即漫流,滚滚滔滔,像一条挣脱束缚的龙,肆无忌惮地扭曲摆动,在华北平原上冲出千条河,万道沟。可是,禹治水并非仅限于黄河,传说他还到过会稽山,到过巴蜀……反正禹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上下,祖国各地。人们都以禹曾经到过自己的家乡为荣耀。

因此我想,禹只是一个传说,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中华民族为曾经带领人民根治水患的众多英雄人物树立的典型,就像今天人们评先进标兵一样,啊,古今多少事,似曾相识呢。

但传说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先有传,后有史,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欧洲人的历史感远远比不上我们,他们直到皈依基督教之后才有了历史意识(见《什么是西方》),才懂得人原来是活在历史中的。可我们的祖先虽然没有基督教那样的宗教,但我们的历史意识早就有了,孔子面对奔流不息的河水发出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是对时间的流逝、人生的须臾发自内心的叹息,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意识的诗意向咏。屈原却问:鲧何所管,禹何所成?可见古之圣贤已经对禹的传说进行过诘问。春秋时代的天子和诸侯,都在宫廷里设置史官,还有左史、右史之官,大至天灾人祸,乃至公卿大臣的言行均记录在册。所以,自古以来,文、史、哲并非三分天下,史其实列在首位。我们的祖先早就知道单纯的史书枯燥乏味,于是把历史著作写成文学作品,比如《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东周列国志》等等,甚至还用诗来记述历史,比如《诗经》里的《雅》和《颂》……正因为重史,古代的史籍洋洋大观,历代的史学家以毕生精力治史,考据史实,著书立说。史,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敬畏感。太史公著《史记》,可是毛泽东偏偏说,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为什么?我想,大凡历史,或见诸笔端,或口耳相传,著者,因人而异,说者,以讹传讹,故史,传也,经过不知道多少遗漏、添加、删改、演绎,然后成为史,所以,史记并非现场笔录,更非实况转播,乃后人传之也。

传说禹治水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妻叹息道,候人兮嗟!她急什么?急等夫君回来,好生个宝宝,后继有人啊。十三年的等待,那是漫长的焦灼和煎熬啊!

但是,即使禹只是传说,水终究是人治的,如果不治水,今天的黄河还是到处漫流,华北平原将会是怎样狂野莽苍的湿地沼泽?中国的治水其实从远古就已开始,据史书,早在周代,公元前685年已有黄河决口的记载,既然有决口,就说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懂得整治河道、修筑堤防,而黄河之堤防,岂止是百年工程?何况黄河常常决口改道,改道后的旧堤防便废弃了,而新的堤防却要从头开始修建!那时的华夏子孙,特别是华北、中原地区的先民,付出了怎样的千辛万苦,才建造了黄河绵延千里的河堤!须知,那时候人口稀少,民力严重不足,可不像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治水工地上总是人山人海,有的是人力啊!古时候,人们信神,也崇敬英雄,就把治水的英雄神化,这样便有了神化的禹,然而真正治水的禹岂止一个!禹的子孙一代又一代,代代不息地治水,可是黄河依然我行我素,泛滥决口改道,时而入渤海,时而入黄海,这才有了今天辽阔的华北平原,才有了黄河中下游的富饶和美丽。

禹,是一个传说,一个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传说,也是华夏先民治水的历史见证。

(本文作者为翻译家,山东大学教授)